

◎创作谈

感受青铜的激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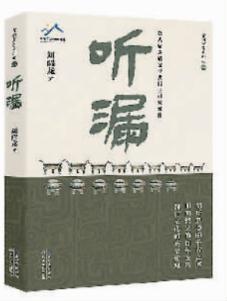
刘醒龙

在我看来，小说，要求写的人和读的人，以轻如鸿毛的策略，处理重于泰山的文本。

2004年，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宝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，心中即刻闪过一道文学的灵光。10年后的2014年，我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蟠虺》出版。从《蟠虺》到新近完成的写九鼎七簋的《听漏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，刚好又用了10年。前10年中，曾侯乙尊盘还是“大冷”的模样，陈列在“大热”的曾侯乙编钟旁，少有人问津。后10年中，考古界的几位朋友，轮流出主意，建议我写过“冷”的，再写写“热”的，接下来应该写那赫赫有名的曾侯乙编钟。

2022年秋天，我在汉阳鲁迅书店，遇见时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的方勤，听说我在写比当年的曾侯乙尊盘更加冷僻的九鼎七簋，他就从专业角度发问：湖北省博物馆里还有一套完整的九鼎八簋，为何要写残缺不全的九鼎七簋？对此，我不无玩味地解释说，1966年在湖北京山出土的有史以来第一套完整的9只鼎，一时间轰动文化界，但在礼制上与其相配的簋，只有7只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这缺少的一只簋，是后来因故丢失，还是根本就不曾有？这与生俱来的悬念，如同历史留下一支神秘之笔，只要掌握好，对写作来说不算是事半功倍，至少也能得近水楼台之便。

20年前初见曾侯乙尊盘，令我怦然心动，忽然得到它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暗示。依此暗示写成的《蟠虺》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首发式时，方勤馆长经过再三确认才透露，正好是《蟠虺》付印的那个时间段，考古队员将《蟠虺》中假设的“曾侯丙”发掘出来了。基于这不同寻常的缘分，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提议，何不再写一部“青铜重器之二”。这话在心里搁了两年，一次在家里与孩子聊起记忆中的听漏工，灵感来了。那是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的，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，每到夜深人静之际，就会手拿一根铁棒，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，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。说完这些，自己就怔住了，随后便告诉孩子们：“青铜重器之二”可以写了。说完，我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档，在上面敲出“听漏”二字。自从与家人说了这独一无二的



▲刘醒龙近照



听漏工，孩子们每隔一阵就问，什么时候开始写《听漏》呀？2022年秋天，我终于正式动笔，最开心的不是作为写作者的自己，而是从本科变成博士生，从中学生变成硕士生的孩子们。多年的积累，使得开头部分进展顺利。到12月中旬，就已经写了近10万字。没想到，疾病的威胁正在逼近，一场大病让我在医院一待就是21天。出院后，在家静养的半年里，与文学相关的一切都被抛得无影无踪，直到2023年夏天，同家人一道到英山县桃花冲山顶上的小峡岭避暑，我才又将电脑打开，继续写作《听漏》。

现实生活虽然不是对文学的唯一恩泽，却是恩泽的最大源泉。

《听漏》中有一句话，“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，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，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。”这句话对以文学名义进行写作具有同等意义。这话明里是说考古，其实是指包括治病在内的人的一切行为。作为个人大病一场后应当如此，作为社会渡一场劫难后也应当如此。

秋天，我在位于武汉南郊的房子里独自待了整整4个月，一边写《听漏》，一边打理自家的菜地与花木，直到年末的最后一天，约40万字的初稿大体完成，才回到市中心的住所过冬。从寒冷的程度来判断，元旦前后，才是武汉冬天的起始。无论是在郊区写初稿，还是回到市中心修改第二稿和第三稿，我似乎更惦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，还有朋友千里迢迢寄来的黑牡丹等花卉。只要一想起它们，哪怕最需要一气呵成的段落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暂时放下，去到菜地或者花园，小心翼翼地将其伺候好了，才重新捡起丢在键盘上的灵感。

从事写作多年，从青年作家熬

成别人嘴里的“老作家”，真正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美妙趣味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从菜园回到书房，或者从书房进到菜园，反反复复、来来回回之后，我将这种从未有过的反应称之为激情，而且是一种与愤世嫉俗完全不同却更靠谱的激情。

这个冬天实在太厉害，接连两场冻雨，将市中心的大树折断了许多。那些四季常青的冬青叶片、正在含苞待放的茶花，全部冻成琥珀模样。凝思修改《听漏》时，隔着双层玻璃也能听见，仿佛人间炸裂一样的声响。待起身开门观看，又脑打开，继续写作《听漏》。

10年前，我的“青铜重器之一”《蟠虺》出版后不久，时逢国庆，方勤馆长突然邀请我到枣阳一处考古发掘现场，用极富诱惑的语气表示，他预感到今天下午那里会挖出重要器物。几小时后，当我们抵达现场时，真的赶上了一只青铜鼎刚刚露出鼎耳。经过一番按部就班的操作，一只典型的楚鼎出现在世人面前。方勤馆长用竹签剔去楚鼎底部的一块泥土，随口来了一句：这是实用器。意思是，这是楚鼎的

主人用于日常烹煮的器皿。在方勤指点下，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残留在楚鼎上的3000年前的人间烟火，头一回感觉到成年的青铜重器也可以无比亲和。

“一个人如果用自个时代的眼光去看石器时代，用嚼嚼山珍海味的牙齿去品鉴原始社会的茹毛饮血，一定是当今地球上最没出息的笨蛋。”写《听漏》时构思的这句话，原本是反着说的，还没动手写出来，我就想明白了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苛求别人，重在对自身缺陷的发现与弥补。接下来便自然而然地涌出几句话：“在历史面前，最能体现王者之气的青铜重器非鼎簋莫属。在辉煌的朝代，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。在衰落的王朝，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败衬托得更加残败。”从《蟠虺》到《听漏》，关于“青铜重器”的长篇小说我已经写了两部，差不多70万字，直到写出这几句话来，才对“青铜重器”有了较深的体察。正如自己在经历过2022年末、2023年初的那场疾病，才对文学创作与垦荒种菜的关系心有所得。那种到死也要显示尊贵，被称为明器的青铜重器，除了随葬于地下再无其他用途，3000年前不是激情的产物，3000年后更是激情的弃物。与青铜重器不只是青铜重器本身一样，小说写到后来，不再是围绕文字打转，也不是用文字与为了吃喝拉撒的事物作半推半就的交换，一定是笔下的文字与自己感知的肉体灵魂产生美妙交融——唯有这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交融，才可以称之为激情。

人们早已熟知曾侯乙编钟，后来又熟悉了曾侯乙尊盘，藏在博物馆幽深处的九鼎七簋迟早也会被人熟悉，熟悉与不熟悉的青铜重器，面孔看上去无一不是冷冰冰的，实际上，激情才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别的什么人，能够感受到藏在它们身后的激情是一种幸运。生活之于文学也是如此，可以说激情需要扛起一座大山，也可以说激情能够怀抱一片大海，还可以说一个人的激情纵然达不到面向整个人类，至少也是一个族群一个社会的理性与感性的共振。激情贮存在我们的骨子里，唯有真实可感地承担和行动，激情的能量才有可能爆发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、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）

《南游记》是胡竹峰新近创作的一部游记散文集，分上中下三卷，由57篇文章组成，记述了作家游历海南各地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。有学者曾说，“游记，它具体而微地书写出作家主观的精神色彩，以及他们接触客观的风景时内心种种悲怆或欢乐的印象、感受、咏叹、呼号、颤栗和搏击，这正是能够感动和启发读者的地方。”胡竹峰在游历海南的行程中领略当地山水人文，从中生发出复杂的情感变化和心灵体认，这种颇具个人化的内在体验，作为作家创作的源头活水。他把对自然的敬畏、对时间的感慨诉诸笔端，叙写自身对生命价值的追问、对沧桑历史的思索。

通读《南游记》，不难发现作家对海岛自然景观、风物人情的细致刻画和生动描摹。《百花岭》写岭上绿意盎然，瀑布如练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观。《椰田古寨》中，古寨古风扑面而来，黎族人对死亡既从容又慷慨的豁达态度令人心生触动。《落笔洞记》由露珠写到石刻，引申出作家要“大笔作大文章”的理想与追求。时光虽将过往蹉跎成了遗迹，但古人曾经驻足过的山水依旧气韵灵动。作家以行走的姿态穿梭于海南山水之间，将往事娓娓道来。在《遗址》中，他想象祖辈的生活，通过虚构故事演绎先民的迁徙与生存。《水会守御所》中，作家站在明代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的城门前，遥想古代的兵士庶民、城郭村落。行旅中的灿烂时光，被作者用文字定格，他登上铜鼓岭观赏苍茫雄浑的海景；在南海博物馆体验沉香与黄花梨交织而成的文化风景；乘船出海，坐在船头看风浪翻涌、水天一色的辽阔景象……

散文创作要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自觉观照。海南的一切，触发了作者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。从孔夫子发出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喟叹起，水与时间



山水间的诗意栖居

张凡 张志英

似乎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作家站在南尧河畔思考时间、生命与水的关系——“时间如水，生命如水。”山水若无文化的浸润，便欠缺几分厚重，作家对海南的抒写不单是借景抒情，更在山水风景和地域风情中杂糅进复杂的人生况味，力求抵达精神的高度。

“古淡”可以说是《南游记》的一大特点。这里所谓的“古”，即作家在笔法上精炼字句，并引诗入文，遣词造句尽显古韵；同时，在内容上描写古人之生活，思辨古人之文章。胡竹峰曾在《与古为徒，一家面目》中谈及，“古人的遣词造句芬芳了国人的文心，文明离不开文字，我希望写出汉语之美，脱胎换骨进入前人营造的珠玑美玉氛围。”而所谓“淡”，即语言淡雅。《南游记》淡而有味，作者在记游感兴与揽胜怀古的同时穿插各种传说轶事，兼顾纷繁思绪和生命情致的展露，在视觉印象和情感体验等方面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与情绪感染力。

《南游记》融文学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，其典雅的文字彰显出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认同。但真正打动人的文字必然与时代有关，与生活有关。在这部行走之书，胡竹峰用手中之笔记录山河、记录生活与时代，用文字联接古今，让烟火气生动浮现在书页之间。诚如作家在接受访谈中所说，“人人离不开生活场，笔录时代，墨色才鲜活。”

（作者分别系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）

“扬帆计划”助推当代文学“出海”

本报电（蒋欣雨、席雨柯）近日，由中国作协主办，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办公室、中国图书进出口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“扬帆计划”文学沙龙在京举行。格非、陆天明、张楚等作家与26位来自意大利、智利、埃及、阿根廷等国的汉学家、海外出版界代表以及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展开交流，搭建起中外文学交流平台。

此次入选“扬帆计划”的作品《登春台》《沿途》《云落》成为沙龙讨论重点。《登春台》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睽违4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。格非谈到，现代小说不断拓展人类对世界和自身认知的边界，作家要致力于捕捉心灵之光，寻找和建立人与时代的真正关联。《沿途》中，作者陆天明重返历史现场，讲述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奋斗与命运。《云落》是一部小人物的心灵史诗，也是一部中

国北方县城的发展变革史。与会汉学家、翻译家、出版人在讨论中表示，以《登春台》《沿途》《云落》为代表的这批当代文学新作，书写了当代中国、历史中国、县城中国等不同面向，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。这些作品具有打破国界、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更多读者共鸣的潜质。大家认为，文学作品的翻译、交流和对话对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，期待更多青年翻译家、汉学家的加入，推动中外文学交流。

据悉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自2022年7月启动以来已推出42部作品。为搭建中国文学与世界读者之间的桥梁，助推这些作品“出海”，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图书进出口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合作实施“扬帆计划”。目前，已有29部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入选作品与海外出版社签订100多项版权输出合同，覆盖26个语种。

“光”系列女性主题书发布

本报电（蒋欣雨）近日，“拿起笔，制造光——‘光’系列女性主题书分享会”在北京举行。书系主编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与徐小斌、周晓枫、王侃瑜、叶昕昀、杜梨、李嘉茵等15位女性创作者展开对话。

据了解，“光”是以女性文学、女性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图书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系列首部作品《拿起笔，制造光》收录散文6篇，分别是周晓枫《雌蕊》、陈冲《把回想留给未来》、徐小斌《美术馆》、冯秋子《我跳舞，因为我悲伤》、草白《常玉》以及莫兰迪《默言（笔的重量）》，同时特别收入21位90后女作家有关女性写作的同题共答。

近年来，张莉提出“新女性写作”概念，她表示，“新女性写作是要理解女性和世界的关系，把女性放在社会关系里去理解。女性的天地非常辽阔，是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与生存的总和”。

与会青年女作家分享了各自的写作故事以及对女性文学的思考。科幻作家王侃瑜说：“今天，越来越多女

性成为宇航员、科学家，我开始有意识地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，书写未来场景中她们可能遭遇的技术变化。”杜梨则强调，女性所拥有的内在力量是无比强大的。

本次活动采取线下分享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，共20余万人参与。活动最后，16位嘉宾每人推荐了一部女性文学作品，希望大家可以在阅读中感受“光”，感受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力量。



◎新作评介

重拾生命的本真

——评格非长篇小说《登春台》

谭复

功者。这些他人眼中气定神闲的成功者，其“登春台”的过程充满了机缘巧合，所经历的生活又不乏相似之处。正如小说扉页上的题词，“在那里日日万事从生，其实本无一事”，格非不动声色地掀开了城市化带来的“联系的陷阱”。

《登春台》在保有强烈现实感的同时，又悄然与现实经验拉开了必要的距离。格非不断将笔触伸向个体成长的生命原点，去勾勒当代人被掩盖在均质化联系下幽微难明的精神图谱。表面上看，4个章节分别对应着4个人物的小传，但实际上《登春台》讲述的并不是彼此割裂的4段人生历程，更像是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要经历的种种惶惑。一些相似的情感体验总是反复出现在不同篇章，遥相呼应。而一旦进入到关于痛苦、迷惘的情感叙述，叙述者的语调声腔便为之一变，从冷静确凿的呈现过渡到不确定的意识流动，如同梦境般飘忽，不自觉地一边对记忆自我修正，一边自我掩饰。

格非自如地调动时间的修辞术，通过回环往复的悬念与伏笔，找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、内在的生命联系，引领读者在不同的时空精神漫游，寻访年少不可得之叙事是如何困扰我们一生，又怎样召唤我们

无数次折返往复。由此，《登春台》每一段人生篇章的我既是“这一个”，也是“每一个”。

必须承认的是，尽管小说结构看上去是平行的，却并不“平等”。前3章的主人公沈辛夷、陈克明、窦宝庆都曾因周振遐的只言片语而如获神启，拾回了直面自己生命中“提婆达多”的勇气。步入生命晚年的周振遐似乎寄寓了作者理想化的人格，是参透人生困苦的豁达长者。小说中浓郁的哲学色彩和玄想气质也几乎都围绕着周振遐展开，从黑格尔的无限性理论到洛伦兹的联系观，周振遐总是处在形而上的高空输出哲理金句，俯瞰着世事变化，如“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挂着一块幕布。幕布把一些东西挡住了。但人其实很清楚，幕布后面有什么”。

小说到了第四章，则笔锋一转，格非延续了《隐身衣》《月落荒寺》中对知识分子的叩问与反思，展开了对过度知识化的讽刺，冷峻地写下周振遐内心世界的虚弱与傲慢。周振遐试图躲开稠密的人际关系，置身被植物包围的住所，追求回归乡土式的隐居生活。但退回到前现代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不过是已一厢情愿的幻想，真实的乡村早已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改变。他自视为世界的观察者而非局中人，实际

上却在隐秘地享受着一种对芸芸众生俯视的“悲悯”。他沉浸于知识与哲学的王国，但仍然无法摆脱沉重的肉身，需要与无聊、病痛、恐惧耳鬓厮磨。

书中那些哲学议论当然是独属于格非的风格所在，但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作者设下的另一种“叙事圈套”。《登春台》的思想分量并不在于文本对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融汇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曾熟读老庄或者海德格尔，既不妨碍你进入《登春台》，更不影响你走向生命的澄明之境。正如附记中被周振遐解惑的众人，懂得了很多道理之后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周振遐的顿悟时刻恰恰来自于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自怜与自恋，真正地走进人群。

在我看来，《登春台》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一种从容且诚实的姿态提出了“下春台”的命题。山河巨变，万物互联，登春台易，下春台难。在过剩的社交联系面前，无论是回归传统的乡土，还是寄身知识的乌托邦，一味地在人群之外消极遁逃并不是从心所欲、通往平和的不二法门。毕竟，生命的本真从来不在日常生活之外，深层的联结往往就始于一次表面的联系，在于重拾身边的“附近”。明亮而清澈的“现在”，就在于我们的在场。



读《登春台》，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一件回环相嵌的套盒或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。在联系性与偶然性之间，现实的经验、情感的流动、哲学的思辨纷至沓来，汇聚成格非笔下广博芜杂的小说世界。读者在此间流连忘返又不免心生疑窦，何为登春台？何处是春台？又该如何下春台？

《登春台》分为4章，彼此相对独立又暗自交织，借助不同代际、阶层、身份的4个人物的命运流转，不着痕迹地将城乡变迁、人口流动、算法控制在非线性叙述结构中串联起来，勾勒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，也即小说标题所揭示的——“登春台”。但不同于常见的奋斗叙事或现代性反思，《登春台》敏锐地锚定了人际关系的“联系性”，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“进城”书写。一方面，城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日益直观，甚至连产生联系的方式都充满了偶然；另一方面，浅表化联系的背后则是重复的日常经验和隐匿的精神疑难。书中错落登场的沈辛夷、陈克明、姚岑、窦宝庆、郑元春、周振遐等人都是城市化大潮下世俗意义上的成